面向克隆时代的人的主体性

陈万求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76)

摘要: 克隆技术引发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方面革命性变革,对人的主体性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多角度地分析了克隆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正负效应,为人们理性分析克隆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影响提供启迪。

关键词: 主体性;正负效应;客体理性;主体理性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80(2004)06-0071-04

克隆技术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中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在现代生物学中,克隆技术被称为生物放大技术,它是生物工程中的关键性技术。克隆技术的产生来源于对生物遗传性质的研究和利用,它经历了植物克隆、微生物克隆、生物大分子克隆和动物克隆四个阶段。克隆技术以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把人类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克隆时代。面向这个时代的人的主体性不断受到影响和挑战。

一 克隆技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正效应

历史上,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必定会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逐步提升人的主体性地位。随着克隆技术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越来越多地取代迷惘和无知,越来越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支配、驾驭外界事物,人的主体性得到空前强化。

1. 克隆技术为人的主体性的提高提供生理、心理基础

克隆技术为人的主体性的提高提供了生理基础,表现在:第一,克隆技术可以改善、修复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时候先天或后天的生理缺陷,使生命机能有关缺陷的人去除缺陷,并且使生命机能完善的人更加完美。卡尔·德里说:“某些遗传歧视问题可通过添加、替换、去活化或激活某些特定基因而得到解决——将某些特定基因带入人体,以使失去的功能得以修复。基因治疗还将使那些没有明显缺陷的人,在健康和行为方面处于最佳状态。”^[1]第二,通过基因重组改善人的身体素质(如体力);改善了人的脑力器官;延长人的寿命。

同时,克隆技术为人的主体性的提高提供了心理前提和智力支持。表现在:克隆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放大了人的感

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功能,同时也大大丰富了人的情感世界,满足了人类精神上、情感上的追求;克隆技术强化了人的艺术知觉能力,扩展了人的情感体验的方式、范围和质量;克隆技术的进步还改变人们原有的思维定势,促使人们建立崭新的、与现代科技相适应的新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势;克隆技术打破了人的“生”、“死”的心理定势,等等。

2. 以劳动工具的变革为中介提高人的主体性

一般说来,人类的生产过程是以劳动者为主体、劳动工具为中介、劳动对象为客体的几个生产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在以往或传统的生产过程中,劳动主体总是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直接结合在一起的,而且生产力水平越低,所付出的体力劳动越繁重。然而,克隆技术正悄悄地改变着这一切。随着原子能的发明和运用、空间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在生产中的发明和运用,尤其是随着被誉为“21世纪的带头学科”的生物工程的兴起,劳动工具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今天,科学技术已经把人类的生产工具、工艺流程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克隆时代。克隆技术用于生产中显著的特点是:一是非独立性。农业时代代表性的生产工具是铁犁,工业时代是大机器,信息时代是智能计算机。而克隆时代没有典型的生产工具,它通过与其他的生产工具结合,不断对其进行渗透、改良而发挥作用。二是广泛性,即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尤其对农业、食品加工、药品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三是技术含量高,前景看好。如果说工业时代机器工具的使用延伸了人的劳动器官,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在克隆时代,克隆技术这种“物化的智力”的广泛使用带

【收稿日期】 2004-07-13

【作者简介】 陈万求(1966-),男,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伦理所博士生,从事哲学、伦理学研究。

给人类的,就是脑力的延伸,智慧的释放。这显然是人的理性、智慧高度发展和主体自主自觉的确证和表现。克隆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会充实主体现实的本质力量,必然会促进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说:人“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者是社会和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4]马克思之所以当年特别看重生产力对个人的发展的作用,就是他认为人的生产活动不仅生产客体对象,也同时生产(塑造)主体本身,他说:“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5]这里,马克思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物质生产过程对人本身的塑造,从而揭示了生产力与人的主体性的提高的内在联系。

3. 克隆技术通过改变劳动对象拓展人的主体性

劳动对象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能加工的一切对象。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物,这是没有经过人类加工的,是自然界纳入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另一类是经过人类加工的物体,是人工创造纳入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克隆技术对劳动对象的改善首先表现在:随着大分子克隆技术即DNA重组技术的使用,劳动对象的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克隆技术中DNA重组技术归纳起来有三种方法:基因注入法、清除法和替换法。基因注入法是把其他物种的某种基因注入到要改造的物种体内,从而获得理想的生物。运用这种基因注入法,人类可以有效地使任何一种生物具有人所需要的特征。基因清除法,是把一种基因从某一种生物体内除去,从而使这种生物丧失某种特性。基因替换法,即把A种生物的基因用另一生物的基因代替,从而使A生物改变成分。^[6]人类运用这些技术,通过对目的基因的剪裁、组合、拼接改造和加工,使遗传物质得以重新组合,然后通过载体进行无性繁殖,并使目的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表达,按照人们预先设计的蓝图产生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转基因产品(transgenics)。这种转基因产品不仅带有天然的优良基因元素,而且剔除了不良的基因元素,同时又增添了多种人工植入的优良的目的基因。因而转基因产品如基因棉、基因豆等在质地上远远超过了非基因产品。正因为如此,基因产业的前景被人们普遍看好。克隆技术对劳动对象的改善还表现在:纳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的范围随着克隆技术的使用必将不断扩大。这是因为克隆技术运用中巨大的生产效率决定的。克隆等生物工程技术应用于生产必将引起工农业生产的一场新的革命。传统农业是一种种植业,它离不开土地和阳光,利用克隆等生物工程技术,可以在无需土壤和阳光的工厂里生产人们所需要的产品。通过植物组织培养,对植物的细胞、组织或器官进行无性繁殖,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就可以生产人类所需要的几乎一切天然的有机化合物;传统的工业运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效率低。利用克隆等技术,也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工业品产量。^[7]“劳动对象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标志之一。”^[8]可见,随着克隆等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作为劳动对象的基因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这标志着人类在更高的程度上认识

和把握自然,标志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的创造性得到空前的发挥。这正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的主体性的充分的展现。

4. 克隆技术使人类成为“创造万物的上帝”

在生物进化史上,自然选择是产生一个新的生物物种的唯一方法,需要的时间至少是3000年。现在看来,克隆技术已经把自然界缓慢创造物种的一元模式改写成为有人类参与创造物种的二元模式。为什么运用克隆技术能够创造新物种呢?“克隆技术是对常规育种技术的一种新的背离,它超越了常规育种,它用人工构建的载体繁殖基因拷贝和转移基因。”^[9]克隆技术“已经卓有成效地为基因水平转移和重组开辟了康庄大道,而以前基因转移和重组却在崎岖小路上匍匐前进。这种基因转移的康庄大道,通过万能的混合管道大肠杆菌,将各个生物圈、生物界的物种同微生物群体连接起来。”^[10]克隆技术借助于人工构建的穿梭载体,完全可以跨越物种的天然屏障,实现同种不同个体之间或在分类上毫无亲缘关系的不同物种之间基因水平转移。例如,把人的基因引入动物或把动物的基因引入蔬菜。而这在自然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可见,克隆技术使人类获得了一种改变生物遗传性状,创造生物物种的能力。并且可以按照人的意愿,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生物新种,大大地加快生物进化速度,改变生物进化方向。有人把它称为“人类充当了造物主”。实际上,这是人类设计新生命,是生物学的一次伟大革命,是人类创造性的在更高层次上的充分发挥。

5. 克隆技术促进了“主体的意志自律”

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赋予了人类责任。生命伦理学是更自觉的价值理论。^[11]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普遍、愈来愈尖锐的社会冲突中人类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突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尖锐了。这是因为:过去历史阶段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包含的一些消极后果,在当代正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新技术革命又为我们消除这些消极的后果、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而当代社会生活的急速发展的节奏,则使这种选择变得非常紧迫。”^[12]现代技术的工具性决定了其应用的不确定性。克隆技术本来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利益与需要产生的,它在给予人类带来好处和利益的同时,它对传统社会、法律和伦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人们必然认真地思考,从而人们的权利、责任与义务意识必然被唤醒,并促使人们积极行动起来,为主体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条件。克隆技术等生物工程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发展和应用这些技术并处在前沿的科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看到了在实验室通过基因重组技术产生新细菌或病毒等病原体的可能。于是,科学家们采取了负责的行动,发表了阿斯拉莫宣言,呼吁在合适的管理规则出来之前,暂停实验。特别是1997年克隆羊多莉问世,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克隆人的自然、社会和伦理大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纷纷制定法规,禁止克隆人的实验。全球从事生物科学的

组织在论争中达成共识,制订了自律规范。1997年5月13日,在世界卫生组织年会上,19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反对克隆人的决议。可见,随着克隆技术的发展,人类凭借价值理性制控着科学理性,客观上促进了人类“主体的意志自律”。

二 克隆技术抑制人的主体性的负效应

克隆技术在使人类日益获得主体能力的同时,却又悄无声息地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类失却主体性地位,对人的主体性发展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1. 丧失人的主体性的异类——克隆人

如果克隆人真的从理论变为现实,仔细考察克隆人就可以发现:克隆人是一群丧失自我、丧失人性,从而丧失人的主体性的异类。

其一,丧失自我。“认识你自己”一直是困扰人类的一个问题。“我是谁?”的思索使个体的自我意识产生。“我”的意识使一个人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别于外物、有别于他人的富有个性的主体性的人。可是,若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克隆人”,他会怎样思索这个问题?他不禁会发出疑问:“我是谁?”“跟我一模一样的那个人是‘我’还是‘他’?”“是同胞兄弟还是父子?”“不管‘克隆人’在后天环境中如何被塑造,但他的心理永远无法摆脱‘前我’的巨大阴影的笼罩,他将被本来尚未彻底解决的“我是谁?”的人生疑问愈益困扰,痛苦不堪。^[13]

其二,丧失人性。“你一定要这样作: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你始终都要把人看成是目的,而不要把他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14]康德的“人的尊严原理”同样适用于克隆人。如果克隆人是目的,克隆人就应该有人类的思想、情感,就有人类的尊严,也就是说,他应该被当作一个完全的、真正的人。事实上,人们会按照现有的价值观来设计克隆人的自然特征,诸如体形、头发、肤色、智力等等。不仅如此,人体器官市场的巨大的商业利润有可能诱使少数人铤而走险,把克隆人当作人体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之一。这样,克隆人的自然选择基因权利被剥夺,他的作为人的尊严被无情地肢解、抹杀。此外,在人们尚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克隆人可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样,克隆人的思想、情感、尊严即他的人性统统丧失殆尽。克隆人仅仅作为了满足人类自私欲望的一种手段而已。克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从本质上讲是人类主体性的丧失。因为,克隆人也是人。

2. 主体“物化”、“对象化”的可能性在增加

克隆技术将为人类和生物界造福:解决温饱、营养问题的植物基因工程,保护和抢救濒危动物的动物基因工程,保护和抢救濒危人种的人的生殖性克隆,自体器官移植和防止衰老的干细胞克隆,根治癌症、心脑血管病、艾滋病的基因治疗等等。但同时,人类生老病死的人工安排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代替自然安排(基因干预、辅助生殖、生命维持技术),人体结构、心理、行为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受人工改变(如药物、电和化学刺激、脑芯片、脑移植、基因操纵),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克隆技术的发展侵犯人权的可能性和机会也就更大更多:个人隐私被侵犯,个人的自主权或自主决定权受到侵犯,人被

当作“客体”、“东西”对待的可能增加,即人易被“客体化”。尤其是挑战人的主体性的克隆人违背了自然的本质,把神圣的人降格为物,从而使人成为技术操纵的对象,以及可以在流水线上大量复制的产品。人仅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存在,只是被利用和被操纵的对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人们“按照不同的需要生产不同类型的人,除了复制天才和复制自己外,也可能复制作为商品的克隆人,如作为输血或供给器官的机器,或者作为性奴隶与役使奴隶,等等。”^[15]“克隆技术是工业社会企图将雌性控制的繁殖变成由科学专家双手控制的变态思潮的最新发展,这一趋势正在加速进行,最后无耻的公司会将繁殖变成服务手段和商品。”所以,胚胎甚至人的胚胎,都可以直接转化为商品,或者变成提供蛋白质、细胞以及器官的动物场的货源,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到。^[16]

3. 人的异化的可能性在增长

马克思是最早对人类异化现象作过深刻批判的思想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人和物的对立、人和人的异化,普遍存在。“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17]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他/她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8]“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己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9]20世纪西方的许多思想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人与机器关系中人被异化的现象更是关注。他们指出,现代社会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技术控制人。在克隆技术条件下,同时存在着克隆及其技术掌握人存在的本质的可能性。

基因武器的安全性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武器经历了冷兵器(以铜铁兵器为特征)、热兵器(以火药为特征)、化学武器、物理武器、核武器等时代,与此相适应,人类的灾难和恐惧与日俱增。而今,克隆技术催生的新武器——基因武器,将给人类的生存和健康蒙上一层新的阴影。长期反对核武器而斗争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说:“我担心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会衍生出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遗传工程就最有可能,遗传工程的疯狂发展正在取代原子能的位置。”^[20]

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这是指由于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处置、使用的不当,而对人类健康或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一是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科学研究表明,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严重的可以致癌或导致某些遗传病。二是转基因产品对自然生态的安全性问题。由于转基因产品是经过科学技术产生的新物种,转基因产品释放到环境中,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即所谓的遗传基因污染,而这种新的污染源很难消除。目前,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在日、美、欧等地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消费者团体掀起了相当规模的反对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的运动。

基因技术崇拜问题。即把基因及其技术的作用神化、扩大化。认为,基因决定生物的性状,通过对相应基因做适当改变,就可以设计和制造满足人类一切需要的生物。通过对基因的操作,世界上所有的主要问题都会迎刃而解。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克里克,1996年就在美国国会发表过以下著名的言论:“我们以前认为命运掌握在星象之间。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主要掌握在基因里。”人类基因组创始人杜贝克也曾表示:“DNA就是真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与DNA序列有关。”基因决定论认为,人的性状、疾病、智力、行为、性格由基因决定,基因决定一切。^[21]

基因武器的安全性问题、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基因技术崇拜问题等等负面影响,实质上都反映了人自身的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是人的文化的危机,是人存在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危机。这种危机客观上消融着人的主体性。

三 人的主体性的构建

与以往科学技术不同的是,克隆技术的对象是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是具有意识和思想的活生生的生命,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克隆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对人的主体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换言之,人的主体性构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迫切。我认为,在人的主体性建构中,正确处理客体理性与主体理性的关系至为重要。

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的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一般说来,理性是相对于感性、知性而言,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方式 and 思维状态,它可以分为客体理性和主体理性。客体理性表现为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对工具的追求、对效率的追求和对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抉择。其特点是它的工具性和手段性,关心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相反,客体理性不关心以至于忽视目的及其合理性。主体理性表现为人们对世界的意义、道德的价值、人格尊严的追求,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终极关怀性。主体理性的本质是生命理性,即主体的价值理性。主体理性尊重的是人本身的价值性,寻求的是主体意识的自由展现。它关心目的及其合理性,而不是只限于手段及其有效性。

客体理性与主体理性,在人的主体性建构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客体理性使人能够冷静地对待客体对象并选择有效的手段和工具。没有客体理性,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就失去了依据,显然就不能建构人的主体性。但是,主体理性在人的主体性的建构中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若没有主体理性,人就失去了活动的内驱力,失去了目的和意义,人的主体性就会出现削弱:重视手段而轻视目的,重视必然而轻视应然,重视物性而轻视人性。

现代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技术文化,是一种十分重视

技术、工具和手段的文化。克隆技术就是这种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在克隆技术带给人们福祉的同时,出现了人的物化、异化甚至丧失人性的现象,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主体理性的建构。所以,人类在重视克隆技术的同时,也要重视主体理性的作用及其建构,使人们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始终追求生命的意义、人的价值、人格尊严,保持一个火热的主体状态而不是冷冰冰的自然状态。

【参 考 文 献】

- [1][美]卡尔·德尔里:双刃剑——遗传革命的前景与风险[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1.85.
- [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2.
- [3]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
- [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9.
- [5]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9.
- [6]张国安.基因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J].哲学原理,1999(7).
- [7]徐兰.克隆的意义与价值标准[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1):67.
- [8]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356.
- [9][10][16][20]Mae - Wan HO.美梦还是噩梦[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1.44、182、192、18.
- [11]邱仁宗.生命伦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76.
- [12]唐凯麟.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伦理意蕴[J].道德与文明,1998(5).
- [13]贺更行.“克隆人”:无所适从的人生[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3).
- [14]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372.
- [15]余谋昌.高科技挑战道德[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6.
- [17][18][19]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97、98.
- [21]邱仁宗.人类基因组研究和伦理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1).

(责任编辑 董华)